

蘇聯語言學家的工作和成就

呂 叔 湘

蘇聯語言學家繼承了俄羅斯語言學的優良傳統，又有斯大林的馬克思主義語言學理論做他們的南針，他們的成就是我們應該研究的，他們的工作方法是我們應該學習的。過去，我受語言的限制，這方面了解的不多。這一次能夠向蘇聯的先進語言學家請教，雖然限於自己的水平，所得仍舊很有限，但還是應該把這有限的收穫向同志們作一報道。其中難免有了解不夠正確甚至有錯誤的地方，希望讀者指正。我想分俄語研究、民族語研究、外國語研究、語言學理論研究這四方面來敘述。

俄語的研究——俄語語法的研究，從羅蒙諾索夫起，在俄羅斯學者中有很長的傳統，在十月革命之後仍然是蘇聯語言學家注意的中心，這方面的專書和論文出版的很多。B. B. 維諾格拉陀夫院士的“俄語”(1947)研究俄語的詞類，分析它們的形態，獲得斯大林獎金。最近由蘇聯科學院出版的“俄語語法”是蘇聯語言學界的一件大事。這是一個集體的作品，由蘇聯科學院的語言學研究所主編。它的計劃和準備工作已經進行了多年，上冊已經在去年出版，下冊的初稿也已經完成，今年年底可以出版。這部書將成為現代俄語語法的權威，具有極大的指導作用。

俄語史的系統的研究是蘇維埃時代才開始的一門學問。關於古代俄語的研究，有С. П. 奧布諾爾斯基院士的“早期俄羅斯文學語言史綱”(1946)，曾獲得斯大林獎金。П. П. 雅庫賓斯基的“古俄語史”成稿多年，在今年年初出版了。但通貫古今的俄語史至今還缺乏權威性的著作，因為條件還不够成熟。

俄語方言的研究已經有50年的歷史，科學院

在1903年就成立了莫斯科方言委員會，1915年，曾出版一冊“歐洲部分俄羅斯方言地圖稿”。衛國戰爭以前製訂了新的全面調查並編製俄羅斯方言地圖的計劃，歐洲部分分為10區，每區一冊，大約有圖一百幾十幅至二百幾十幅。戰爭期間停頓，戰後積極進行，有兩冊——西北區和莫斯科以東的中央區——已經編好，本年內可出版一冊。歐洲部分估計要到1965年才能全部完成。亞洲部分的調查計劃現在還沒有擬定。這是一個大規模的集體工作，進行調查時主要依靠大學和師範學院裏俄語組的教師和學生。這個工作完成以後，對於俄語史和俄羅斯人民史都會提供寶貴的資料。⁽¹⁾

詞典工作在蘇聯語言學工作中佔極重要的地位。遠在內戰時期，列寧就在蘇聯語言學家面前提出編輯現代俄語大詞典(從普希金到高爾基)的任務。為了完成這個光榮任務，許多專家參加了這個工作。由Д. Н. 烏沙柯夫主編，經過10多年，出版了四卷本的“俄語詳解詞典”(1935—1940)。後來又在這個詞典的基礎上編印了一卷本的“俄語詞典”，編輯者是С. И. 奧熱夫。這本詞典在1949年出版，又經過徹底的修訂，在1952年再版，是現有的最好的一卷本俄語詞典。目前在進行中的還有一部鉅大的科學性的“現代俄羅斯文學語言詞典”和一部篇幅較小的規範性的“俄語詞典”，都由語言學研究所編輯。前者分14卷，約收25萬個詞，後者分3卷，約收10萬個詞，所列成語及例句較少。前者已出版2冊，預計要到1959年才能出齊。這部詞典卷帙繁重，主要是供學者、教師和作家們參考，不切合一般人的需要，因此科學院主席團又在去年通過一個議案，另編3卷本供一般讀者之用，預定在1956年出版。此外，語言學研究所

(1) 關於俄語方言地圖和下面要提到的普希金詞典，本刊1952年第7期曾有專文介紹。

還準備出版一部成語詞典，一部正音詞典，一部正字詞典。

值得特別一提的是語言學研究所現在編輯中的“普希金詞典”，這是一種新型的作家詞典，除了把普氏詩文中所用的詞盡數收入，按意義分項解釋並引例而外，還把這個詞在普氏全集中出現的處所逐一列舉在該詞之後，這樣一部詞典就兼有全集用詞索引的功用。這部詞典的卡片工作在戰前已經開始，編寫工作到戰後才進行。全書分3冊，第一冊已完稿，即將付印。所以要編普希金詞典，是因為普氏是現代俄羅斯文學語言的奠基者。語言學研究所準備在編完這部詞典之後，接着編18世紀俄羅斯文學語言詞典，以後再編17世紀以前的俄語詞典。這3部歷史詞典，加上前面說過的14卷本現代俄羅斯文學語言詞典，綜括了俄語裏從古到今的詞彙，將成為研究俄語史的最可靠的資料。

作家語言的研究在蘇維埃時代也日益發展。研究普希金、果戈理、萊蒙托夫、克里洛夫、別林斯基、屠格涅夫、謝德林、車爾尼舍夫斯基、Л. 托爾斯泰、柴霍甫、高爾基、瑪雅可夫斯基、А. 托爾斯泰、蕭洛霍夫等人的語言和風格的文章已經有了很多。可是作為語言學的一個部門的修辭學還沒有得到應有的注意。去年出版的А. Н. 格伏茲夫迭的“俄語修辭學大綱”是這方面一個嘗試。蘇聯科學院語言學研究所的語言教育研究室正在準備編印一本“修辭學問題”。

二

民族語的研究——蘇聯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有近60個民族，他們的語言分屬於斯拉夫、烏格羅·芬蘭、突厥、蒙古、通古斯、伊朗、高加索等語族。這些語言大多數在十月革命以前還沒有文字，帝俄時代的學者對於它們僅有極其初步的認識。在十月革命之後，尤其在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成立之後，為了實現列寧和斯大林的民族政策，提高各民族的文化，民族語言的研究就具有頭等重要的政治意義和科學意義。為了完成這個任務，列寧和斯大林的黨與蘇聯政府，和培養其他科學部門的幹部一樣，就在這些其語言還有待於研究的民族中間培養出大批的語言學幹部。俄羅斯學者和各民族學者合作，給沒有文字

的語言創造文字，給原來用亞剌伯字母或其他陳舊字母的改換新的字母，並不斷的改良這些字母和正字法。這並不是很簡單的事情，它要求蘇聯的語言學家勤勤懇懇地研究許多活語言和它們的方言，研究它們的語音系統和語法結構，選擇民族文學語言的方言基礎，因為如果不這樣做，就不可能創造出一套適用於它的字母和正字規則。由於蘇聯語言學家的努力，在十月革命後的20年，蘇聯境內各民族絕大多數已經有了自己民族語和文字。還不止如此，現在各民族的語言差不多都有了語法書和詞典，從小學到大學都已經建立起本民族語言的教學，用民族語出版的書籍和報刊日見其多，各族人民對於民族語和它的歷史都非常熱愛，這都是蘇聯語言學家不倦的努力的成績，也是列寧、斯大林的民族政策偉大勝利的明證。

關於民族語文工作的經驗，我們曾經向蘇聯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的H. A. 巴斯卡可夫博士和學術秘書B. B. 哥爾農格同志，烏茲別克科學院語言文學研究所的B. B. 雷謝托夫所長幾位請教。大概的情形如下：

十月革命後進行民族語文工作時，蘇聯語言學家遇到的問題有兩個：一，在一定的方言基礎上建立民族的文學語言；二，創造文字和改革文字。這兩個問題密切相關，但是可以分開來說。各民族情況也不一樣，大致可分三類。第一類，有書面的民族語，如阿塞爾拜疆、烏茲別克、達達爾。第二類，尚未達到此種程度，雖有文字，不普及，如阿爾泰、科米、卡拉卡爾帕克。第三類，全無文字，如哈卡斯、諾該。

關於選擇民族語的方言基礎，第一類民族的問題在使書面語和羣衆接近。起初曾犯錯誤，選用農村語言做基礎。經驗證明這不是好辦法，乃改用大城市的語言做基礎。例如烏茲別克的民族語用塔什干和費爾干那兩處的語言做基礎。第二類民族的文字往往只是教士們使用的，語言基礎太狹窄，是小地區的方言。如阿爾泰族的文字以且列馬特方言為基礎。語言學工作的主要任務是改變它的方言基礎，如阿爾泰語改用阿爾泰地區的方言做基礎。第三類民族的特點是方言多而差別大。但是還只能選擇一個方言做民族語的基礎，可以容納別的方言裏的一部分詞彙，用來豐富民族語的詞彙。語言學家的工作要與社會實踐相結

合，民族語的推行要依賴學校、報紙、劇院、廣播等等，還是很重要的。

在方言紛歧的民族建立一種全民族的文學語言往往要經歷困難的過程。蘇聯到現在還有幾個民族沒解決這個問題。例如鄂畢河畔的亨特族，有南北兩種方言，差別很大，很難統一。科米族和莫爾道維族（Мордовцы，非 Молдаване）也都是方言紛歧，並且已經各自發展出兩種文學語言。去年莫爾道維開會討論如何統一文學語言，會上曾有人提出主張，將兩種文學語言折衷調和，合為一種，多數與會者不贊成，認為這種人爲的語言，原有兩個地區的人都不懂，徒勞無功。

關於各民族所用文字，他們按各民族的具體情況來解決，沒有一律的辦法。格魯吉亞和阿美尼亞代表一種情況，他們各有自己的歷史悠久的文字，一直到現在還是用這種文字，沒有改。另一種情況是原來沒有文字，創造文字的時候就用俄語字母做基礎，酌量增減。經過比較曲折的是阿塞拜疆、烏茲別克、哈薩克等民族。他們原先用阿剌伯字母，1930年以前有過些不重要的改良，1930年以後先後改用拉丁字母。但成績不好，因為拼音不易準確，而且與用俄語字母各民族的文化上的聯絡比較困難。所以從1940年起又先後改用俄語字母。

他們這些寶貴經驗，無疑對於我們在兄弟民族中做語文工作是有很大的參考價值的。

三

外國語——在十月革命之後，蘇聯語言學家加強了外國語的研究，尤其是東方外國語的研究。東方各國大多數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反帝國主義的民族運動在十月革命之後蓬蓬勃勃地發展起來，這不可能不引起蘇聯人民的關懷，同時這些民族的語言也就吸引了蘇聯語言學家的注意。

由於中國人民革命的偉大勝利，漢語的研究在東方語中已居首要的地位。東方學研究所本年度的研究題，關於語言的有9題，其中有5題是關於漢語的，（一）中國詞彙學，（二）中國語言學問題，（三）北京話在民族語發展中所起的作用，（四）中國現代文字，（五）東干語語法，可爲明證。（其餘4題是：阿富汗語語法，“老蒙

文”語法，土耳其語教程，庫爾德語俄語字典。）最近兩年內已經出版的著作有A. A. 龍果夫的“現代漢語語法研究”和И. М. 鄂山蔭主編的“華俄辭典”。該所的“東方學研究所集刊”還準備在最近出版一期漢語研究專號。東方學研究所的漢語研究者和莫斯科各校的漢語教師共20多人，有合編一本漢語語法的計劃，已經分配題目，準備在1954年出版。但是應該指出，有一部分漢語學家曾經受過馬爾學說的影響。馬爾認為漢語是長期僵化在原始階段的語言，從這個觀點出發就不可能用正確的方法研究漢語，因而過去有一個時期，漢語的研究是沒有多少成績的。現在這種錯誤觀點已經糾正，蘇聯的漢語研究一定會迅速地發展起來。

日本語的研究在革命前還只剛剛萌芽，但在蘇維埃時代有長足的進展。現在無論在口語方面或文語方面，蘇聯的日本語學家都有很有價值的研究。蒙古語方面蘇聯有傑出的學者Б. Я. 維拉捷米錯夫，近代印度語言方面有А. П. 巴朗尼可夫，他們的著作在這些語言的研究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其他東方語言的研究，如阿富汗語、馬來語、朝鮮語等，也都是蘇維埃時代才開始的，在這以前，沒有人用科學的態度來研究這些語言，有的甚至沒有人理會它。

西歐語言雖然不是蘇聯語言學的重點對象，也還是有許多學者在那裏潛心研究。最近出版的В. Ф. 歇希馬列夫的“法語形態史”、斯切柏林—卡緬斯基的“斯堪的那維亞語言史”和即將出版的雅爾切瓦的“英語史”，都是評價極高的著作。

四

一門科學的進展有賴於正確的指導思想。語言學在蘇聯，大家知道，曾經走過一段彎路，這就是馬爾的所謂“新學說”所指引的道路。直到1950年6月，真理報展開關於語言學的討論，斯大林發表“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才把馬爾的錯誤路線糾正過來，把語言學安放在健全發展的道路上。

斯大林的“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除了在各種報紙和雜誌上登載而外，在蘇聯境內用39種民族語言刊行的單行本已達8,752,000冊（截至1952年10月1日爲止）。這部天才著作已經成爲馬

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對於社會科學乃至自然科學都具有極其重大的意義。在語言學者中間，學習的熱烈更是無與倫比，在各種集會上報告、討論，在各種刊物上寫文章解說、闡發。根據“語言學問題”1952年第6期的附錄，單只1952年上半年發表的專刊和論文關於普通語言學的就有一百二十篇，幾乎沒有一篇不是和斯大林的語言學說有關係的。

三年來蘇聯語言學家在理論方面的研究情形，大致如下：

(一) 馬爾學說的批判問題——關於這方面的重要論文已經編成“反對語言學中馬克思主義的庸俗化與歪曲化”第一、第二兩輯出版。現在語言學家論文中還常常提到馬爾學說的這一點或那一點而加以批判，因為它的影響還沒有完全肅清。

(二) 語言和思维的關係問題——這方面的研究主要在哲學研究所和俄羅斯聯邦教育科學院的心理學研究所進行。大致歸納成三個問題：詞和概念的關係，句子和邏輯命題的關係，各種詞的邏輯範疇和語法範疇的關係。

(三) 語法結構問題——主要任務在探究各民族語言語法結構上的特點。

(四) 詞彙問題——構詞法的問題和基本詞彙問題都已有不少討論。基本詞彙如何決定，這是蘇聯語言學家中間很引起爭論的一個問題。曾有人主張選一個詞的歷史長短來決定，又有人主張必須見於同一語族所有語言的詞才能算是基本詞，但這兩種說法都未能獲得多數學者的贊同。

(五) 如何重建比較歷史研究法的問題——已有布拉霍夫斯基、哥爾農格、特隆斯基等人發表的文章多篇，現在還在組織語言學家寫論文。

(六) 語言史和語言發展的內部規律問題——這裏面包括問題很多，最重要的如：(1) 語言史和人民史的關係：斯大林指示，要聯系人民的歷史來研究語言史，最近出版和即將出版的幾種語言史都已經從這個觀點出發。語言研究所的突厥系語言研究室已經把研究突厥系語言史和使用這一系語言的諸民族的歷史的關係訂入五年計劃，作為主要任務。(2) 蘇維埃時代民族語言的發展問題：蘇聯境內有許多民族在十月革命時還處於部族或部落狀態，是在蘇維埃時代才形成民

族的，他們的語言發展史很值得研究，就是早已經有民族語的民族，他們的語言在蘇維埃時代也有了新的發展，所以語言學研究所把蘇維埃時代民族語言發展史列為五年計劃中研究題之一。(3) 語言發展的內部規律問題：斯大林指示，語言學的主要任務在於研究語言發展的內部規律，所以這方面論文很多，語言學研究所曾在1952年2月間召開一個會議討論這個問題，但所得結論還是比較抽象，意見也還有些分歧

語言學理論方面的研究論文，有先發表在各種刊物上，後來編成論文集的，也有組織好了就用論文集的形式發表的。已經出版的重要論文集，除上面提到的“反對語言學中馬克思主義的庸俗化與歪曲化”外，有“語言理論與語言史問題”(語言研究所，1952年)、“語言學問題”(莫斯科大學，1952年修訂再版)、“語法結構與詞彙問題”第一、第二兩輯(列寧格勒大學，1952年)。這些論文集都是綜合性的，語言學研究所正在計劃在兩三年內出版一系列的分類專題論文集，如“語法結構問題”、“詞彙問題”、“比較歷史研究法問題”、“語言發展內部規律問題”等等。

五

蘇聯語言學家所從事的工作，如果從性質上來分，可以分成三類。(一) 現代語言的規範化工作。前面所說俄語和其他民族語的詞典工作、語法工作、正音工作、正字工作，都屬於這一類。(二) 語言史研究。如前面所說奧布諾爾斯基、雅庫賓斯基和其他學者關於俄語史的研究，或是關於各個時代的，或是關於各個問題的。方言地圖的工作和歷史性詞典的工作也屬於這一類。不但是俄語，別的有較長的文字歷史的民族語如烏克蘭語、阿美尼亞語、格魯吉亞語等，也都有學者在從事語言史的研究。至於方言的研究，更是大多數民族語言裏普遍展開的一個部門。(三) 語言學理論的研究。

這三項工作是互相關聯的，是統一的。關鍵就在於斯大林的指示：“語言學的主要任務是在於研究語言發展的內部規律。”

現代語言的規範化，這是語言學家結合實際，直接為人民服務的一項重要工作。語言是人們交流思想的工具，是社會鬥爭和發展的工具，所以

一個民族需要有一種統一的語言，這裏面要儘量避免語音、拼法、詞彙和語法上的紛歧。蘇聯科學院語言學研究所出版的“語言學問題”創刊號（1952年2月）的社論裏這樣說：

“語言在不斷的運動和發展中。這種不斷的運動使語言發生變化。語言結構整個來說是穩定的，尤其是它的基本核心；但是在語言發展的各個時期都出現，而在不同的時期以不同的強度出現，語言結構的個別成分的變化和改進。這種發展使語言的各方面——詞彙方面、構詞法方面、發音和重音方面、甚至語法方面——產生搖擺不定的現象和分歧的格式。……

“確定各民族語言的結構並且爲它製訂條例，擬定字母和拼寫的系統，編寫規範性的語法和詞典，建立正字法的規範，說明民族的、文學的語言和它的特點跟民間的、方言的基礎之間的關係，整理並發展學術名詞，討論翻譯的問題，研究如何把小的無文字的語言併入更有發展前途的密切相近的親屬語言的問題——這一切是蘇聯語言學家緊張地工作的領域。”

規範化工作的重要，在還處於形成過程中或剛剛形成的文學語言最爲顯著。蘇聯有不少民族的文學語言正在這個階段，它們的規範化問題是蘇聯語言學家經常討論的題目。拿最近的事情來做例，去年12月在列寧格勒開了一個北方諸民族語言問題討論會，除研究機關和大學裏的許多專家外，還有十幾個北方民族的知識分子多人參加，對於北方諸民族語言的規範化問題做出許多決定。今年5月，科學院語言學研究所召開一個全蘇性的語言學家會議，討論年輕的文學語言的規範化問題，包括（一）規範化的根本原則，（二）編語法課本的原則，（三）編字典的原則，（四）民族語與方言的關係。

但這不是說，有較長久的歷史的文學語言就沒有規範化的問題，一則如上面所說，語言是處在經常的變動中；二則像俄語這種文學語言，它的使用範圍正在日益擴大，有如同一篇社論所指出：“在蘇維埃時代，廣大羣衆參加非常積極的生活，公開的言辭，無論是口頭的（如報告、演劇、廣播）或書面的，它的重要性都大大地增加和擴大了，因而語言修養問題獲得了全民的性

質。”爲了防止混亂，規範化的工作也是不可缺少的。蘇聯科學院主席團在去年8月議決在語言學研究所內建立一個“語言修養研究室”是有它的一定的意義的。這個研究室的主任С. И. 奧熱各夫在“文學報”上發表了一篇關於這個研究室的任務的文章，有很好的反應，短期內收到很多建議，可見蘇聯人民對於俄語規範化工作的關心。

從語言學的歷史來看，規範化的工作是一直有人在做着的。詞典不是新的東西，語法書在印度和歐洲也有很長的歷史。但是這一項工作過去做的有缺點，主要的原因是跟語言史的研究沒有很好的聯系。這兩方面工作各不相謀的結果，規範化會流於主觀，語言史的研究也會脫離實際。前面所引的“語言學問題”社論裏又說：

“對於具有不同的修辭色彩的分歧的形式，不同的語言使用者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人認爲新起的形式破壞語言，引起混亂，他們堅持傳統是正確性的準繩。有些人的意見恰恰相反，樂意接受一切新的東西，認爲這是反映語言發展的活的趨勢，輕易地給予它們文學語言的公民權。語言規範這個概念本身就不能不顧及語言現象的歷史的變更和歷史的多變性而加以確定；這個概念應該有歷史的根據。一般情形是這樣，比方說，19世紀初還是文學俄語的規範的用法，現在成了過時的東西；而相反，不久以前還是當作俗話或是土話的，往往已爲文學語言所容納，變成規範。接受還是不接受新的，保存還是放棄舊的，是由語言發展的一般趨勢和內部規律來決定的。……擺在蘇聯語言學家面前的任務是確定一個語言的歷史上各個時代尤其是我們的時代的規範的概念。從詞彙的、語法的、發音的（包括重音的）規範的、具體的、歷史的理解出發，我們的語言學家應該爲各個民族語言建立一系列的參考書——詞典、正音詞彙等等，供給學校和廣大的讀者應用。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各階層人民的文化高度發展，規範性的參考書的需要是非常迫切的。”

要做好現代語言的規範化工作，必須拿語言發展的內部規律做根據，語言史的研究也必須以探討語言發展的內部規律爲目的，斯大林提出“語言學的主要任務是在於研究語言發展的內部規律”，它的重要性就在這裏。